

在祖國成長

(本文插圖刊第10、58頁)

●謝東閔(中華民國第六任副總統·現任總統府資政)

滿懷信心回國升學

民國十四年春天，我已十九歲，讀完臺中一中四年級，將升五年級時，決心前往祖國升學。

我對祖國的情形知道得很少，只在「外國地理」及「外國歷史」課，獲知一些皮毛，因此，到大陸升學，面對不可知的未來，相當冒險。

中國幅員廣大，我必須先決定目的地，再做行動準備。在過去四年裏，曹貫世、吳守禮(曾任臺大教授)、翁均安三人是常和我在一起的同窗，彼此無所不談。因此，我知道臺南籍的翁均安有一位哥哥翁俊明先生畢業於臺灣醫專(今臺大醫學院)，在上海開設俊明醫院。我覺得翁先生既能在上海立足，我不妨到這一個中國第一大城看看。

除我以外，員林的曹貫世也想前往大陸，我們兩人商議同行，以便在陌生的新環境裏，有什麼困難彼此也有個照應。我們把計畫告訴翁均安，他決定寫信交我們帶到上海見翁俊明先生。這使我們對上海之行有一點信心。

不過，促使我敢於面對不可知的未來，除了

濃厚民族意識外，另有兩項因素：一是我讀過許多世界偉人如華盛頓、林肯……等人的傳記，知道他們遭遇過很大的艱難困苦而後克難成功的故事，相信我回到祖國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也能够克服它。另一點就是小時候我看過布袋戲，戲中的主角總是在艱危險阻中遇到「貴人」相助，逢凶化吉。我相信自己到了祖國，遭受困難時也可能遇到「貴人」。

而且，我想起一兩百年前，祖先增福公冒險來臺，不也是來到前途難卜的陌生環境嗎？他後來得到「貴人」——鹿港批發商的幫助而致富，這使我相信回到中國，只要努力奮發，縱遇困難，也會到處獲得溫暖。我確信：「天無絕人之路」。

這麼一想，我就更堅定意志，對於返回祖國升學充滿信心。

我和曹貫世都把意願稟告各自的父母。

曹貫世比我大一歲，他的生母過世，父親續弦，繼母有一個女兒一起到曹家。讀中學時，他就跟繼母的女兒結婚。儘管家有嬌妻，曹貫世仍

決定和我一起到祖國升學。他家境好，父母不反對他遠行。

父親起初不大贊成我遠離。他引用俗語說：「搬巢母雞不下蛋」。意思是見異思遷不求安定的人，不會有什麼成就。我把蘊藏心底的意思說明，父親便不再反對。母親也沒有阻撓愛子遠行。不過，我知道母親非常捨不得我離開；從她的神情，我知道她內心是多麼難過。臨行，我實有不勝依依之感。

迂迴日本轉往上海

民國十四年四月，寶島還剩下一絲春天的涼意，我和曹貫世踏上那充滿挑戰性而又不可知的征程，迂迴日本到上海去。

這時，父親代表益美商行，在日月潭附近監督陳三元五個糖廠製糖，手頭不大寬裕。他交給我三百日圓，叮嚀說：「到了祖國，如有困難，就回臺灣來」。母親一臉憂戚，沒說什麼，她的心情盡在不言之中。

我從二水車站坐北上火車，曹貫世和我約好在員林車站會合，同往基隆港。我們的行程保

密，除了翁均安，同班的其他同學都不知道，我們沒敢向大家辭行，爲的是避免消息洩漏。要是日本政府知道我們要回祖國，不但走不成，以後還會有麻煩。

那時從臺灣到大陸，有客輪直通，但是這樣的出境，需先向日本政府請領護照，我們如走此線，成功機會渺茫。所以，我和曹貫世決定迂迴日本，轉往上海。我們打聽過，從臺灣往日本，同屬日本「國內旅行」，不必請領護照。日本到上海也免護照。我們從基隆上船時，假如海關詢問，可以伴稱到日本升學，日人不會起疑。至於從日本到上海，告訴海關說中國留學生，要返國度假，亦可順利過關。

兩人到基隆住一夜，第二天登船。巨輪緩緩駛離碼頭時，我思潮起伏，有「別矣，故鄉！」的惆悵，但亦興起「我們開始接近夢想已久的祖國！」的喜悅。

這是我們第一次出海，有點新奇。爲了節省開銷，我們住最便宜的三等客艙，睡的是疊席，十幾人一間。當船身不停地隨波浪搖盪前進時，頭有點暈，兩人就躺在艙內。遇到風平浪小，就到甲板，憑欄眺望，但見海天壯闊，茫無際涯，那彷彿是我們面對着的茫茫前程。

船抵日本九州門司，旅客都上岸，不少人趁機遊覽，但我們只想早一點前往上海，無心瀏覽日本風光，怕的是耽擱時間，發生意外波折。我們住進門司一家旅館，探詢前往上海的辦法，得知九州的門司和長崎都有客輪常川往來上海。我們決定從長崎登船。

祖先庇佑安抵國土

在門司的旅館，我們初嘗溫帶奇特的春寒。四月初，門司的氣候仍冷，旅館的棉被又厚又重，夜裏睡覺時，我爲棉被壓得幾乎喘不過氣，巴不得快些天亮起床。

從門司到長崎的火車上，沿途上來一些農夫，所講的話有一部份我們聽不懂，原來日本有地區性的方言土腔，這是我們在日本短暫過境的發現。

長崎到上海，有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的「上海丸」和「長崎丸」兩艘客輪往來。我們在長崎住一晚，翌日登「長崎丸」。買船票時，船公司詢問爲什麼要去上海？我們照事先準備的，伴稱中國留學生，要回上海去，兩句話就輕易過關了。

長崎輪出海，我們二人相顧微笑，慶幸一路平安，有脫離虎口的感覺。

兩三天航行，長崎輪抵達上海，鳴放幾聲低沉的汽笛，緩緩靠泊滙山碼頭。

步下扶梯，踏上祖國泥土，有點緊張，却是最興奮的一刻。進入海關檢查時，關員用國語和英語問話，我們聽不懂，遂即翻一翻我們的行李，沒有發現違禁品，就放行了。

走出海關，提着行李站在碼頭旁，我們一時有些茫然。第一次出遠門，環境陌生，這種感受難免，何況來到的地方是四百多萬人口的「十里洋場」——上海？

在舉目無親的上海，我們首先要尋找的是白克路俊明醫院院長翁俊明先生，盼以翁均安的介

紹信，獲得他的協助而順利升學立足。

上海港口的碼頭，特別是日本客輪定期進泊的碼頭區，馬車很多。旅客走出海關，馬車夫便紛紛上前搶拉顧客，他們把旅客的行李提過去，旅客只得跟着走，馬車夫的生意就做成了。

上了馬車，車夫對我們說話，我們聽不懂，拿翁均安的信，指着地址給他看。他點點頭，便策馬前行。

過了好些時候，馬車似乎總是在拐彎抹角兜圈子，我發現馬車還是在港區附近，再過些時，蹄聲停歇，馬車不動了。我想白克路應該沒到，可是馬車夫轉身，向我們伸手，並開口說話。我們知道他要求付錢。

「還沒有到達目的地，怎麼可以要錢？」我和曹貫世用閩南話問他。

馬車夫必然聽不懂我們的話，但他看我們的表情和態度，知道我們要到達目的地才付錢，於是和我們爭吵起來。我們不知他是要先拿到車資，還是另有什麼用意。如果先付車資，是否會把我們送到目的地？我們有點疑慮。

正在爭執的時候，有兩個男子走過來，到了我們身旁，用日語問：「你們兩人是留學生嗎？」

「我們是從日本回來的中國留學生。」我說。

那兩人表示，他們是日本商社職員，問我們究竟發生什麼事？我說明爭執的原因，兩名日本人責罵馬車夫，不該半途向旅客要錢。那個時期，滙山碼頭一帶是日人勢力範圍，馬車夫挨罵，

不敢吭一聲。隨後日人請我們下車，揮手叫他把車開走，另叫一輛送我們往白克路。

經過這個小波折，我們到達俊明醫院。這是我們回到祖國第一個落腳地。

我家遷臺第一代祖先增福公，一百多年前自福建老家到臺灣，而今我這第六代子孫却自臺灣投向祖國懷抱，增福公在天之靈一定支持我「不做日本順民」的志氣。

踏上祖國芬芳的泥土這一天，是我生命歷程中極具意義的日子；我的願望實現，開始接受大時代漫長的洗煉。

學會識別銀元真假

俊明醫院是一所中型的私人醫院，由三位醫師合作開設，一位是翁俊明先生，一位姓陸的台南人。另一位是浙江省溫州人，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。

很不巧，翁俊明先生已離開俊明醫院，前往福建廈門開業。陸醫師也不在。溫州籍醫生可用日語和我們溝通，但他實在太忙，無暇招呼我們。好在陸醫師有位弟弟，從臺南來上海已九個月，稍熟環境，可給我們指點一二。

雖然沒見到翁先生，溫州籍醫師看了翁均安給翁先生的信後，願意提供病房給我們住，附帶供應伙食，每人月付二十塊大洋（銀圓）。我們就暫住醫院裏。

父親給的三百日圓，在上海換成二百七十塊大洋。醫院裏的人教我們如何辨別銀圓真假，用小嘴對著銀圓的邊緣用力吹氣，能吹出悅耳顫動

的響聲，就是真的，不致上當。

在俊明醫院安頓下來，白天，我和曹貫世穿著臺中一中的制服出門，認識環境。陸君警告我們，不要再穿日式制服，因為日本侵華日亟，上海出現反日氣氛，穿日式學生制服在街頭行走，可能被人扔石頭攻擊。他建議我們訂製西裝。為了安全，我們照做，陸君於是打電話請西裝店師傅到醫院來為我們量尺寸，每套二十七塊大洋，兩人各製一套。陸君又教我們打領帶，這一改變，得免受受人特別注目。

祖國的學制和日本不同，我們原以為四月來到上海，馬上可以報考學校，想不到九月才有學校可讀，算起來我們有五個月時間無事可做。每個月空費二十塊大洋，有點心疼。心想何不利用空檔學英語會話？我們又想，學習英語最好進入美國人家庭，替他們整理庭園，如割草、打掃，或在廚房洗碗、洗菜等等，直接學習效果一定好，即使得不到工資也沒關係。

計議定了，我們買一幅市區地圖，辨認方向和位置。上海市雖有電車、汽車、馬車和黃包車，我們不乘車，一起步行，沿途注意觀察，碰碰運氣。

俊明醫院附近的南京路，是上海市熱鬧中心，距離靜安寺路不遠，靜安寺路一帶是高級住宅區，靠近跑馬場，因此，我們可以不怕迷路。美、英……各國洋行的高級人員，以及各國的總領事、領事等，很多住在這裏。我和貫世每天走過這一帶張望，看見洋房外的寬大庭園，時有洋人一家大小，在綠茵上擺桌椅，悠閒地坐着喝咖啡

談天。我們想向他們找工作，必須說明意願，說意願必須講英語。我的英語比曹貫世好些，但真正面對洋人時，實在派不上用場。於是決定寫英文信，以便遇到機會時遞給對方。

英文信由我撰寫，是在苦翻英日字典之下寫成的。文法對不對我沒把握。信的大意說：「我們是住在日本的華僑子弟，來上海求學，這裏學制不同，日本四月開學，上海九月才開學，在九月以前，我們想利用這段空閒時間學英語，我們願意為府上做工，趁機向你們學英語。」信寫好，我帶着。我們看了好多家可以嘗試的對象，特別是庭園綠草比較長的，心想這些人家沒有時間整理庭園，或許願意接納我們。好幾次，我們想按門鈴，可是害羞、膽怯，總是站在大門前不敢伸手去按。

我們發現，每天下午四、五時，很多洋人的庭院都出現全家一起喝咖啡的休閒場面。見到庭園草長的，曹貫世就推我的肩背，要我試試，結果我又難為情地作罷。我總是說：「明天再來！」

日復一日，我們每天早晨八時半出門找機會，出發時都告訴自己：「今天一定要成功！」却都失望而返。

美人相助找到學校

一天早上，將近九時，我們走到西摩路轉角一棟兩層洋房外，看見房子不大，庭園草很長，沒有整理，庭園門外停着一輛轎車，二樓有位洋人正在刮鬍子，我們認為是好機會，想進去毛遂

自薦，曹催我按門鈴，我還是猶豫不前。兩人在庭園門外徘徊，這個情形被二樓上的洋人居高臨下看得清楚，他自己下樓，走到門外來看我們，我們膽怯，想退走，他已站在我們面前，不好退了，於是我鼓起勇氣，用英語和他說話，他聽不懂。我就拿出事先寫好的英文信給他看。

「你會日語嗎？」洋人看完了信，用英語問我。

我用日語回答：「是的。」
他馬上用日語和我交談。

真是奇蹟！在這個四百多萬人口的大城裏，我們出門找機會，接觸到的第一個人，竟然是會說日語的美國人。他熱心、親切，約四、五十歲。他在我寫的英文信背後寫了「江西路裕豐洋行」幾個字，約我們第二天上午九時去找他。我們高興之至，可是忘記問他的姓名。

回到俊明醫院，溫州籍醫生告訴我們，裕豐洋行是一家大洋行，專做中國、日本、美國進出口貿易。我拿地圖查明江西路的位置，它是南京路的一條橫街。我們先去看一趟，發現這家洋行樓高七、八層，確實是大洋行。我猜，這位洋人可能要我們到洋行任職。

第二天，我們按時到裕豐洋行，被看門的印度「紅頭阿三」擋住，原因是我們說不出要找誰。兩人楞了一下，仍想走進去，「紅頭阿三」還是不讓進去。無可奈何之下，猜想那位洋人可能下午五時下班回家。於是我們下午五時再到西摩路轉角處的洋樓按門鈴。那位洋人出來，看到我們就問：「爲什麼上午九時沒來？」我說：「我

們準時到了洋行，因爲不知你的大名，被門房擋住。」他遞拿了一張名片給我，約定明天上午九時，仍在裕豐洋行見面，並說：「只要拿這張名片，門房會帶你們進來找我。」

這一天晚上，我們兩人很興奮，巴不得早點天亮。早上八時許，提前趕到裕豐洋行，站在門口等候，九時，洋人開汽車到達，看見我們，立即下車招呼，拍拍我們的肩膀，帶我們進入洋行，「紅頭阿三」看了，顯得吃驚。

我們在會客室等候一、二十分鐘，這位熱情的美國人拿了他寫好的信給我，指示我們到四川路外國人的YMCA（青年會），去找他所介紹的美國人。

我們到了YMCA，見到該會的宗教部長，他操英語，我們不懂。他找一位中國人來，說上海話，仍不通。於是另找一位在日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謝扶雅先生，謝先生用日語和我們交談，才解決了困難。我告訴謝扶雅先生，到上海是爲了升學，謝先生把我們的意思轉告宗教部長，部長請謝先生帶我們去沈家灣私立承天中學，立即插班四年級。順利辦妥註冊手續，由俊明醫院遷入學生宿舍，開始過安定的學校生活。

承天中學由幾位聖約翰大學畢業生創辦，利用一座廣大的四合院兩層樓木造房屋，作爲校舍。我和曹貫世入學，在校內造成轟動，大家圍著我們叫「嗲威您」，就是「台灣人」三字的上海腔。同學們缺乏對台灣地理歷史的知識，以爲台灣人是另一人種，感到新奇。

在這個充滿上海話的學校裡，語言不通，我

們顯得孤寂而沉默，報紙也看不懂。同學們看我們似乎傻傻的樣子，有人對我說：「傻阿摩林！」我知道「傻」是「你」的意思，不知「阿摩林」何意，因英語稱廈門爲「Amoy」，遂從語音猜想他說我是廈門人。那時我能講的上海話只有最簡單幾句，雖然自己不是廈門人，對方說話總要回答，於是說：「是個，阿拉是個阿摩林。」想不到這樣應答，同學們哄堂大笑。後來，我才弄清楚「阿摩林」是傻瓜之意。

寂寞孤獨中，幸而同班同學有一位福建人，可用閩南語和我們交談，他親切地幫助我們，使我們慢慢地適應環境。

秋節感言獲得鼓勵

承天中學雖然設備簡陋，師資却很好，不過在語文方面，我遭遇另一困擾。年少時，我曾在二水媽祖廟內的私塾，跟張秀才讀過一年「三字經」和「論語」，僅僅學會用閩南語朗誦，而不解文義。到了承天中學，完全派不上用場。國文老師是浙江紹興人，鄉音很重，教的又是文言文，程度很深。我聽不清楚，也看不懂。所幸其他課程雖用英文課本，但內容都和在台一中所讀過的差不多，結果我的考試成績都在八十分以上。國文考試成績較差，老師同情我初歸故國，語文剛起步，分數沒打很低。

雖然國文程度太差，有一次作文却獲得讚許。那是中秋節前的作文課，老師出的題目是「中秋節感言」。我在文中寫自己來自台灣，知道台灣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遭受壓迫，生活

痛苦。自己到了祖國第一次過中秋節，深深體會到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和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的悵鬱。希望台灣同胞有一天重回祖國懷抱。這篇作文雖然文字不怎麼通順，老師讚揚我很愛國，給我八十分。後來，由於我用功讀書，學業成績列為優等，學校頒發獎狀鼓勵我。

在承天中學四年級時，我參加一次別開生面的方言演講。這次演講的起因，是吳稚暉先生于民國十四年，在上海倡導說國語，推行注音符號。上海寧波同鄉會響應講國語運動，特地舉辦一次方言演講大會，請來自各省的人以方言演講，目的是讓大家都聽不懂，繼而認識推行國語的重要。我來自台灣，被學校推選為講閩南語代表，參加方言大會。當我用閩南語演講的時候，台下聽眾像「鴨子聽雷」——完全聽不懂，只是哈哈大笑。講完，我接著用國語說一遍，大家才知道我講的是什麼。

這是我回祖國第一次參加演講，也是個性內向的我第一次接受歷練。

投身反日反英風潮

初入承天中學我還遇到一件難忘的事。長期以來，日本人經常利用各種方法侵略我國，在上海日本租界內，尤其橫行無忌，引起國人憤恨，反日情緒日益高漲。我才到上海一個多月，五月卅日市內發生「五卅慘案」。事件起因是日本「內外棉織株式會社」的我國工人被開除數名，工人派代表與廠主交涉，日本廠主老羞成怒，槍殺工人代表顧正洪，打傷其他六人。工人譁然，紛

紛罷工抗議，五月三十日，各學校學生紛紛停課，組織反日宣傳隊，憤怒地到處演講日人暴行，發起抵制日貨運動。我也參加反日行列，因不會講上海話，只擔任散發傳單工作。反日行動旋即發展為示威大遊行。可是，侵華野心勃勃的日本，不但不為殺害工人顧正洪而表示歉意，還藉口護僑，派兵到上海。

示威大遊行當天午後，數名參加遊行的學生，在南京路被英租界警察逮捕，其他學生和路人非常憤怒，幾百人跟隨到英租界老關巡捕房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，想不到英國捕頭未發警告，即命令印度巡捕向民衆開槍，造成十二人死亡，二十餘人受傷及五十餘人被捕的慘劇，於是反日示威演變為反日反英運動，上海市各界支持工人罷工，商人罷市，學生罷課，風潮浩大。這是我第一次在祖國體會列強欺凌，目睹國人沸騰的團結愛國行動，我來自異族統治下的台灣，感觸特別深刻。

在上海三年多，我經歷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的一段過程。

民國十四年四月，我抵達上海時，全國仍處在軍閥割據、政治紊亂、民不聊生的局面。此外還有共產黨徒勾結蘇俄散佈邪說，興波作浪。在這些嚴重內憂之下，英、法、日、德、俄等列強不斷向我國威脅侵略，更激起全國民衆憤怒，凝聚了濃厚的民族意識。

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，廣東省發生中山艦事件，暴露了共產黨的政治陰謀。共產黨計劃以綁架方式，迫使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

務委員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先總統蔣介石離開廣州。幸好陰謀沒有得逞。

國民政府見局勢嚴重，決定揮軍北伐，統一全國，於是在六月五日，任命先總統蔣公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積極備戰，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北伐。第三天，中共召開其第二次擴大會議，決定對國民黨進行「擴大左派，打擊右派」策略，策動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左派份子，製造國民黨內部分裂。

但是，國民革命軍仍一路勢如破竹，順利掃除湖南、湖北、福建、江西諸省軍閥勢力，軍威大震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。

在上海方面，先總統蔣公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，報紙就刊出這一令人振奮的消息，此後，北伐雄師連下數省，逐漸逼近上海，其力量實際上已暗中湧入上海，對市民提出最新的北伐軍戰報。

那時，我已遷出承天中學宿舍，租居老靶子路附近福生路小巷弄堂的亭子間。房間約三坪大，月租六元大洋，三餐包飯吃，有時也用煤油爐自炊。每天晚上，我的信箱或門縫，往往有人塞進傳單，內容都是國民革命軍進展的好消息。有一張油印傳單說：「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將軍的部隊，已到達杭州，逼近上海。」

喜見滿街通衢國旗

戰事即將來臨之際，民衆亦喜亦憂。喜的是國民革命軍快要統一中國，大家可過太平繁榮的日子；憂的是戰火迫近眉睫，擔心性命不安全和

生活不安定。

曹貫世住在交通大學附近，見校區變成訓練戰鬪員的基地，有人教導學生學習射擊機槍。學生們學會射擊後，三、四人拿一挺機槍去攻擊軍閥部隊。

畏懼戰火的民衆，扶老攜幼，帶着鋪蓋、包袱，爭相逃入英、法等國租界暫時避難。我的住所京滬鐵路開北火車站附近，靠近英租界，目睹了民衆恐慌擠向英租界的情景。

由於逃往英租界的人很多，英軍在租界路口設置拒馬，留一個缺口讓難民進入。當湧到的難民太多時，英軍就把缺口封閉，一個人都不讓進去，於是租界外形成人山人海。

當遠方傳來隆隆的炮聲，等在拒馬外的難民有如熱鍋上的螞蟻，緊張不已，於是有的四散另找避難處，有的株守原地，等候英軍重開缺口。

在國民革命軍強大壓力之下，軍閥張宗昌還在做白日夢；他雇用白俄軍官組織砲兵隊，駐守開北車站，我看到這批白俄軍佈陣備戰。可是當革命軍進逼時，白俄砲兵隊自知大勢不妙，識相地向北撤退。

與逃難的人潮相反，當革命軍尚未開入上海之際，上海市很多勇敢的愛國青年不顧危險，毅然由法國租界到郊外狙擊北洋軍隊，響應革命。

商界人士也很勇敢，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公司首先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與英警還發生一場衝突。繼之是廣東人集居的武昌街，一夜之間全部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。我第一次看到整條街道懸掛國旗，一片振奮人心的新氣象，感受

了無法形容的喜悅。

除了白天從遠處傳來隆隆的炮聲，夜裡也能清晰地聽到郊外機槍射擊聲和炮彈爆炸聲。不過，我沒聽到上海市區發生戰鬪的消息。幾天後，北洋軍隊完全撤退，國民革命軍開進上海市區，受到成千上萬民衆夾道歡迎。

國民革命軍北伐過程中，共產黨不斷利用機會顛覆破壞，製造「寧漢分裂」，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，中國國民黨實施全面清黨，確立反共基本國策，革命軍繼續北上，不久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。

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舉國歡騰。我更是高興！記得讀台中一中時，教外國歷史的日本教師嘲笑「中國是從來沒有統一過的國家」，如今我回到祖國才兩三年，祖國統一，我想，這一下子那位日本老師再也不能神氣地嘲笑中國了吧！

面臨生計斷炊危機

國家大局日形開朗之際，我的景況却愈益困難。

十六年初，接到父親來信說：「家境一天不如一天，無法再爲你籌學費，你最好回台灣來。」

這是個很大的考驗。我不能也不應返回日本佔據下的家鄉。可是繼續留在上海，却面臨生計斷絕的危機。

既然不能回台灣，只有在上海想辦法生存。我聽說有兩種工作最安定，等於金飯碗，可舒適過一輩子。一是海關工作，一是郵政職務。欲從

事這兩種職務，英文程度一定要好。我的英文不靈光，想補救這個缺點最好進入英國人辦的學校。英租界工部局有一所專爲外國人開辦的「托馬斯·韓福禮」男校，是修習英國語文最好的學校，只要申請獲准入學，可編入非以英語爲母語的民族學生班。我申請就讀獲准。這個班裡有日、法、俄等國學生三十餘人。

初入這所學校，天天考試，今天數學，明天地理，有時考常識，多以是非題測驗，測定學生程度，以便編入適當班級。經過兩星期測驗，校方把我編入「香港大學預備班」，教學目標是準備投考香港大學。這所學校特別重視英語，每天第一堂課聽寫英文，由前一天聽寫成績最好的學生，朗讀英文書某一頁，全班學生邊聽邊寫，寫好了互相改正，評定分數，送請老師紀錄。我們的英文課本都是學校供應的不同作者著作二、三種，不用時交還學校。

學校教學的原則是，學生能够做的，儘量讓學生自己做，老師站在輔導地位，這種非注入式教學方法，饒富啓發性，效果很好。

這個學校另一個優點，就是學生讀到一個階段，導師認爲成績優良，可調整班級。香港大學預備班的，可調整到高一層的劍橋大學預備班，將來投考英國劍橋大學。

學校使用的其他課本，全部採用英國國內的教科書，但內容不難。導師說，我的程度不錯，聖誕節後可以升到劍橋大學預備班。

可是，我反而不想讀了。因爲，基本上我返回祖國，是爲了讀大學，追求較高深的學問，爲

祖國做點事。如果讀這種英國學校，最後考進海關或郵局工作，安穩捧着金飯碗過一輩子，有什麼意義？何況這所英國學校學費昂貴，每月十五元大洋，我也負擔不起。結果，讀了半年，我決定投考大學。

考入東吳大學肄業

十六年九月，我順利考上東吳大學法學院。東吳大學幾個學院都設在蘇州，只有法學院在上海虹口崑山路。上課時間在每天下午，對利用上午半工半讀的學生很方便。

我進入東吳大學這一年，中國教育史上開創新頁——初辦男女合校。法學院第一次有了女生，只有兩位都在我們班上，當真是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。

兩位女生都是上海富家千金，氣派很大，到班上課都開自用汽車，而且，她倆很會打扮，明艷照人，身上灑着高級法國香水，每次來上課，人未到，撲鼻的香氣已先飄到，因此，每當教室門口附近嗅覺敏銳的男生直覺地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話聲剛過，便見兩女生婀娜多姿走進教室。男生們聞香辨人，很靈，頗添班上幾許情趣。

東吳大學法學院長是吳經熊先生。在他主持下，我們受業于衆多名教授。胡適之先生第一期教我們中國哲學史上卷，第二學期教美國杜南的哲學史話。潘光旦先生教我們行爲心理學，使用英文原本，我的英文差，有些地方看不懂。詩人徐志摩先生剛從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回來，教英文，講授的都是英國的詩與文學，他每次走進課

堂，全用英語講課，我像「鴨子聽雷」，聽不懂。我們的政治學教授是張慰慈先生，著有《政治學大綱》，也是名教授。這樣的教授陣容很紮實，除英文以外，我從他們那裡受益不少。

在所有教授中，胡適之先生的口才與幽默令我難忘。他上課時，總是連續二小時，中間不休息。

徐志摩老師是位很「羅曼蒂克」人物。他和陸小曼女士相戀的羅曼史，一時傳爲佳話，無人不知。每次徐老師到校授課，都由陸小曼女士開車送來，下課時她又開車來接，很引人矚目。

決定前往廣州深造

艱難困苦中，我又遇到奇蹟。

我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唸了兩星期書，又接到父親來信：「益美商行經營糖廠徹底失敗，我被宣告破產，祖厝被債權人訴請法院拍賣。商行的負債，合夥人都不認賬，並脫產逃債，我已完全無法寄錢支持你求學。」父親說得很肯定，這真是太大的打擊，因為我在上海舉目無親，沒有錢就無法生活。更談不上讀書了，我會不會輟學？最後關頭已經來到。面對絕望局面，苦惱不已。有一天同班的廈門籍謝同學對我說：「老謝，你會日本語文嗎？」我答：「會。」

他說：「有兩位砲兵營長，是張發奎將軍的部屬，要到日本留學，想請懂日本語文的人補習，你願意教嗎？」這實在是絕佳的消息。小時候我在布袋戲裡看到的「貴人相助」情節，已經出現，我一向相信的「天無絕人之路」，也應驗了

。這是我返回祖國遇到的第二個奇蹟。第一個奇蹟和第二個奇蹟有共同點，都和日語有關。我遇到會講日語的美國人，雙方順利溝通，由他協助而走上升學之路。現在遇到的第二個奇蹟，則使我能利用日語教學，賺錢維生和求學。正是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」
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擔任補習教師。兩位砲兵營長年約三十五到四十歲，和我約定，九月中旬開始上課，每星期一、三、五夜間七時上課到九時，如遇他們有事，可更改時間，補習費每人每月二十塊大洋，月中付錢。這些收入維持我的生活和讀書開銷，綽綽有餘。

授課地點在兩位營長同住的寓所，坐一段電車，再步行一些路，沒什麼不便。爲了教好日本語文，特地到書店找中國人編寫的日文課本，教學時，每人拿一冊，我唸一句，他們跟着唸。我也教他們日語文法。教了一年，兩人的日語雖然不流利，仍赴日留學。我失去補習費收入，但略有積餘，盤算之下，毅然決定轉學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，以求順利完成學業。（摘自歸返一書）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破損，請寄回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。